

# 策划



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,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《请推广学校折》,第一次向清廷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。七月,孙家鼐上《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》,提出6项办法。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,光绪帝颁谕,称京师大学堂章程“纲举目张,尚属周备,即著照所议办理”,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,原设官书局及新设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。

## 京师大学堂 诞生于公主府

京师大学堂的校址和嘉公主府是乾隆帝四女儿和嘉公主的府第,和嘉公主为乾隆帝纯惠皇贵妃苏氏,于乾隆十三年(1745)所生。公主府位于皇城以内,靠近紫禁城,在其东北角的马神庙街,与景山相隔一条街。马神庙是明朝建的,清乾隆时迁移,人们习惯上仍称这条街为马神庙。从府第的位置,可以看出乾隆帝对他俩的宠爱。这个公主府大约就在和嘉公主下嫁时修建的。巨型砖砌成的高墙,院中的许多殿堂、厅室,还有后院一排两层楼,据说是当年和嘉公主的梳妆楼,习称公主楼。这些都是当年的建筑,到光绪时已经空闲。

1898年11月,内务府将在和嘉公主府第基础上略加修葺扩建的大学堂校舍,正式移交管学大臣孙家鼐。那时的校舍南北六十丈,东西四十丈,共计修复房屋三百四十余间,新建一百三十余间。从当时上海的英文周报《北华捷报》的报道看,除原有的公主楼外,还新建了近代教学楼。孙家鼐于12月向慈禧太后上奏折,汇报有关京师大学堂开办的事,其中说及当时的校舍只能容纳二百多人。变法失败以后,慈禧太后对举办京师大学堂一事予以肯定,说“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”,所以被保留下来。孙家鼐虽为光绪帝的老师,也倾向变法,但他提出“中学为主,西学为辅”的主张,与康梁的“中西并用”有很大区别,加之他又是咸丰年间状元,以此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,在变法失败后,仍能继续任管学大臣。

1900年,义和团进入北京,住校学生纷纷告假回家,学堂只好暂时停办。当时的管学大臣许景澄,因反对慈禧太后的对外政策被杀害。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期间,俄、德军队先后占领京师大学堂作兵营,校内房屋遭到严重毁坏,书籍、仪器、家具等,也被联军官兵抢劫、破坏一空,整个校园残破不堪。

光绪末年,京师大学堂东边叫汉花园的地方(后改名沙滩),有一块八百多平方丈的空地,清政府将它拨给大学堂,以增建校舍,当时先作了学校操场。民国初期的北大校址主要仍在马神庙,那时地名改为景山东街(“文革”时改为沙滩后街)。1914年秋季开学,学生人数比以前增加很多,已有九百多人,校舍紧张拥挤,除在原址扩建、改建一部分用房外,学校要求教育部恢复清末在德胜门外修建新校舍的工程,没有得到批准。此后学生越来越多,1916年,已达到一千五百多人。学校当局向比利时借款,在附近汉花园的学校操场上,建了一座四层红砖楼,有三百余间房子,即今天的北大红楼。红楼于1918年8月落成,原计划作学生宿舍,落成后改为文科教室和图书馆。那时的北大分为三院:一院在沙滩红楼,是文科所在地,又称文学院,有国文、哲学、历史、英文四门(后改称系);二院在景山东街,即原来的京师大学堂,是理科所在地,又称理学院,先有数学、物理、化学三门,后来才有生物系;三院在北河沿,是原来清末的译学馆,为法科所在地,又称法学院,国学的研究所也设在那里。 朱玉婷 整理



京师大学堂教职员合影



京师大学堂堂牌



京师大学堂修业证书



京师大学堂旧址

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——北京大学前身,于清光绪二十四年(1898)创办。创建一所大学,对于现在的国家来说,并非难事,而对于当时的晚清政府来说,却是举步维艰,争吵了十几年,也没建成。

张亚琴

# 创办大学坎坷路

## 受命于危难之际

1898年春,维新运动再次高涨,光绪皇帝顺应时代潮流,经慈禧太后的同意,颁布了《明定国是诏》,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帷幕。《明定国是诏》不过400多字,却以三分之一的篇幅谈到了京师大学堂:“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,尤应首先举办。著军机大臣、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议奏。”就这样,创建京师大学堂作为变法的“天字第一号工程”,正式上马。

可是,时隔半月,仍不见总署大臣们的任何动作,创建京师大学堂又将成为一句空话。光绪皇帝怒不可遏,6月26日,他下了一道充满怒气的上谕:“前因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倡,特降谕旨,令军

机大臣、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回同议奏,即着迅速复奏,毋再迟延。倘再仍前玩愒,并不依限复奏,定即从严惩处不贷。”于是,康有为就让梁启超参考英国、美国、日本的大学章程,进行起草。梁启超吸取日本学规,参以本国情形,拟订了《京师大学堂章程》,共分8章52节。7月3日,总署上报了《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折》,当即得到批准。同时,皇上还任命时任吏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的孙家鼐为管学大臣。由于管学大臣既担负着创建京师大学堂的重任,又兼负管理全国新式学堂的职责,所以,孙家鼐既是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,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部长。

## 巧施计保全学堂

接到任命后,年已古稀的孙家鼐只争朝夕,“每日会集办事各员,公同核议,虽不在学堂办事之人,亦多方咨访,广集众思。总期受以虚心,任以实心,持以公心,矢以诚心,博取众长,折衷一是。”1899年8月19日宣布正式成立并开始招生。由于宿舍场地尚未建成,只好先从一千多报名的学员中,录取二百余人先行开课。天有不测之风云。就在京师大学堂经过一番筹划,一切均已就绪时,9月21日,慈禧太后收回政权,再次垂帘听政,发布了逮捕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的通缉令,开始了对维新党人的残酷镇压。

戊戌变法的成果全部付之东流,一切又都恢复了旧制。

慈禧太后复辟后,刚毅、徐桐等守旧大臣坚决要求把京师大学堂扼杀在摇篮里。曾任大学堂总教习的丁惠良在《北京围城》一书中回忆说,闻讯之后,他就去拜见太后宠臣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,提出:查禁大学堂,将会在外国人面前丢面子。2003年7月,北大史专家肖东华等在《风骨——从京师大学堂到老北大》中预言:“戊戌政变发生,旧党保持朝政,新政多被废除。独京师大学堂赖孙家鼐之力得以保全。”

## 提出西学为用

在慈禧的允许下,京师大学堂经过了二年多的筹划,总算正式开办了。

从一开始,孙家鼐就认为,京师大学堂应以“中学为主、西学为辅,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为宗旨。在学科方面,他提出拟分天学、地学、道学、政学、文学、武学、农学、工学、商学、医学10科,因此需延聘中西总教习各2人。在选择教师方面,孙家鼐认为中国教习应选取品行端正,学

问渊深,又通达中外大势者担任,而外国教习既须深通西学,又须“精识华文”。而入选的学生,一定要切实考验考生的中西各学,择优选取,并须“性行纯正,身家清白”。他还设想着,假如毕业学生如科举不中,则由学堂发给“金牌文凭”,派往总署充译员,或任教习;或分送南北洋海军、陆军、船政、制造各局为帮办等,以广出路。

## 停办、复办的坎坷

可孙家鼐的殚精竭虑、兢兢业业、谨慎小心,以古稀之年为清朝廷当局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,仍然受到当时满清贵族顽固势力的反对。

开办不久,就受到御史吴鸿甲和几个军机大臣的诬告,说京师大学堂“糜费太甚”请饬“归并删除”。顽固势力的代表慈禧太后在1899年5月6日下旨要求大学堂进行整顿。并批评孙家鼐“开办以来,时滋物议,是办法未得指归,更何以激励士类,殊失朝廷实事求是之意”。这样一来,使得刚刚开办不到一年的京师大学堂就又搁浅了。

受到这些指责和批评,格外使孙家鼐心灰意冷。这时他已是七十三岁高龄了。他便连上两道奏折,称病请辞。当

朝未允辞官,只准休假。

公元1902年,慈禧太后在元月十日下午旨全面恢复京师大学堂,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。这时七十七岁的孙家鼐又受命担任第一任总理学务大臣。他就任后,对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体制,作了精心的研究、精细的设计。公元1905年12月12日,孙家鼐上书中央一级设立学部统管全国教育,直接管辖大学堂;各省教育领导体制归学部办理;举人、进士要定名额;解决废科举、兴新学以后,新旧体制转换问题等一系列的建议。不久当朝就采纳了他的建议,成立专职统管全国教育事务的正式中央行政机构——学部。由荣庆任尚书。这时的家鼐公已经是八十岁了。